

人物

1997 6
RENWU

● 绿岛集中营修炼出的不屈灵魂
● 「真正的人民记者」
● 邵老爷子创业记
● 王淦昌：此身已许核聚变
● 「沙漠考古」第一人
● 给李国文「相面」



人物

6

1997

RENWU

总第一〇六期

人民出版社《人物》编辑部

- 特稿** 绿岛集中营修炼出的不屈灵魂
——访台湾“劳动党”副主席、“中国统一联盟”
执委林书扬 ————— 杨立宪 徐青 5

*

- 往事回眸** “真正的人民记者”
——《光明日报》记者陈宗立 ————— 叶辉 18

*

- 奇人列传** 邵老爷子创业记
——记演讲学家、《演讲与口才》
主编邵守义 ————— 任吾 刘兆明 29

*

- 名人** 王首道的三次婚恋 ————— 陈利明 39
与家庭

*

- 怀念集** 击败时光的老人
——悼霁野恩师 ————— 陈漱渝 50
“贡献犹多热与光”
——我的老师张明养教授 ————— 戴文葆 60

*

- 踏遍青山** 景爱——“沙漠考古”第一人 ————— 何勃 65

*

- 名人轶事** 毛泽东的水竹居茶情 ————— 凯亚 77

*

- 征文启事** 《与共和国一道成长——同龄人自述》
大型征文联合启事 ————— 82

*

- 科技精英** 此身已许核聚变
——写在王淦昌教授九十华诞之际 ————— 甲辰 84
“悬索桥李”——李国豪在德国 ————— 代琇 庄辛 92

执行编辑:李京华 封面设计:肖 辉

文 坛	给李国文“相面”	韩小蕙	100
百 家	乡愁下的诗情		
	——余光中的文学与生活	张 雷	111

*

百 味	一位世纪老人的自述(三)	董竹君	123
人 生	梦断蓝桥五十年		
	——记美籍华人潘力生、成应求夫妇	钟 扬	135

*

奉献者 之 歌	为富大仁王竑筠	高伟杰	143
------------	---------	-----	-----

*

环 球	推陈出新		
采 风	——英国新首相托尼·布莱尔小传	安 澜	153
	第一个进入西藏的英国人		
	——乔治·波格尔	彭 苏	163

*

艺 苑	“库车姑娘”阿依吐拉	恒 章	170
春 秋			

*

历 史	赵秉钧之死		
沉思录	——助桀为虐的下场	王雅文	174
	“通过我们最好的行为来预告人的出现”		
	——萨特的最终追求	刘甲桂	181

本刊一九九七年总目录			189
------------	--	--	-----

●封面	演讲学家、编辑家邵守义	●封三	改刊启事
●封二	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封四	吴晗(塑像)

MAIN CONTENTS

The Unyielding Soul Tempered in Green Island Concentration Camp

——An Interview of Lin Shuyang, Deputy – Chairman of
“Labour Party” and Member of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ina Reunification League”, Taiwan

.....Yang Lixian & Xu Qing(5)

“A True People’s Correspondent”

——Notes about Chen Zongli, Correspondent of

Guangming Daily Ye Hui(18)

Story of the Old Builder Shao Liu Zhaoming & Ren Wu(29)

The Three Marriages of General Wang Shoudao Chen Liming(39)

Mourn My Teacher Li Jiye Chen Shuxu(50)

Jing Ai – the Pioneer of “Desert Archaeology” He Qing(65)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90th Birthday of

Professor Wang Ganchang Jia Chen(84)

Li Guohao in Germany Dai Xiu & Zhuang Xin(92)

Tell Li Guowen’s “Fortune” by Reading His Face ... Han Xiaohui(100)

Profile of Tony Blair, British New Premier An Lan(153)

George Bogle, the First Englishman Who Entered Tibet ... Peng Su(163)

The Last Pursuit of Jean – Paul SartreLiu Jiagui(181)



——访台湾“劳动党”副主席、
“中国统一联盟”执委林书扬

杨立宪 徐青

在台湾，一个地主家庭的后代，毕其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投身于反日殖民、反蒋专制的台湾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当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度过了34年又7个月的漫漫岁月，并作为最后两名在押“政治犯”之一而被“假释”时，25岁的青年已成老者。然而，依着那份坚定的信念，怀着那颗赤子之心，他又将自己融入了反独促统的历史伟业中！

1996年仲夏，我们走访了来北京参加两岸学术交流会议的林书扬先生，听他讲述自己追求光明而又坎坷的一生……

思想启蒙——麻豆林家

发源于阿里山系万岁山的曾文溪，是台湾较大的河流之一，它

绵延 140 公里，滋养着台湾南部的嘉南平原。在这块以水稻和甘蔗为主的丰饶平原的中部，散落着几处市镇，麻豆镇就是其中之一。在日据时代，殖民统治下的农民没有种水稻或种甘蔗的选择权，因而也没有对经济利益的选择权。由此而激起的台湾反日农民组合运动在 20 年代蓬勃发展，麻豆即是当年拥有 3 万成员的农民组合本部的所在地，而轰动一时也牵动了殖民地反帝战局的几场大斗争，如台南墓地抗争运动（反对日本殖民当局将祖坟墓地改建运动场）等都集中在曾文溪流域的几个城镇乡村。

1926 年，林书扬降生在麻豆的林氏家族。林书扬的父亲林碧辉是麻豆林家一门第四房的第四代，在祖先迁台开基创业、家道逐渐兴旺的基础上，林碧辉一辈成为台南有名的大地主。日据时期的林家，面对殖民社会中种种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压迫，一方面以传统的汉民族主义顽强地抵御着日本奴化的冲击，另一方面则不断地接受先进的社会思潮，将其付诸于反殖民、争自治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当时台湾三大林氏家族中与日人相处得最不好的一族。林书扬从小深受家族的影响，其中尤以父亲林碧辉和两位表兄庄孟侯、庄孟伦对他的影响最大。

林碧辉对林书扬的影响主要是汉民族主义。在林书扬的少年时代，日本进行奴化教育的书籍、杂志及少年读物充斥台湾，林碧辉担心孩子被日化而忘记本源，便特意请族人到对岸的厦门去买福州市小学校的全套国文课本带回台湾。林书扬和哥哥每天从公学校（日本在台专为台人子弟设立的小学校）放学回来，便把书包丢在一边，由父亲亲自教导一小时的中文课程。不久林碧辉又让林书扬到附近的一家“汉学仔”（汉文私塾）念汉文，直至日本殖民当局全面禁止民间私塾为止。林碧辉好读四书五经等传统古典，写得一手好楷书。他相信儒教入世的改良主义。他每天必读中文报纸，从不念日文书。他也是台湾反日爱国民众团体“文化协会”的成员，经常与族人一起讨论农民组合的事情，往往还花很多时间与来访的客人讨论时局。他常常尖锐地批判日本殖民当局，终其一生（1942 年病逝）不愿和日本殖民者交往。

比林碧辉小十五六岁的庄孟侯，是林书扬大姨家的长子。其家庭环境与林家一样，在日据时代仍保留着顽强的汉民族主义的书香风格。与林碧辉不同的是，庄孟侯在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之外，又接受了现代的社会科学知识，这使他走上了与林碧辉“躲进小楼成一统”完全不同的处世道路而成为台湾反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从台北医学院毕业后，他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工作，在往来于厦门、基隆间的一家船运公司作船医，并在此期间秘密加入了国民党。

20世纪20年代后期，岛内的政治改良运动和民众启蒙运动不断发展，庄孟侯以自己的学业及胆识，在政治运动中脱颖而出。他参加了“文化协会”，担任了文协的教育部长和《大众时报》的董事。1928年因在台南市南门墓地事件中表现突出而遭到约半年的牢狱之灾。此时他也是台湾日本当局反日黑名单上的重要一员。

台湾光复后，庄孟侯担任台南市三民主义青年团（该组织在台以国民党左派的形象出现）干事长，一年多后，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日益增多并日趋尖锐。“二·二八事件”期间，庄孟侯一方面多次提出强劲有力的革新要求，运筹领导了大型群众集会，指导民众选举了过渡时期的台南市长，呼出“反对内战”、“台湾自治”的口号，另一方面也不断告诫群众行事不可盲动。“二·二八起义”被镇压后，庄孟侯被捕，因“感念”其长期从事反日运动，国民党当局将其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坐牢年余，他即因患肝疾而被允许保外就医，1949年病逝。就在他逝世的当天，国民党军法处对他发出新的逮捕令，罪名是“叛匪谢雪红的同党”。

1940年林书扬考入当时的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现台南一中的前身）时，庄孟侯是他的保证人，林书扬还在庄家寄宿了一段时间。林书扬从庄孟侯身上学到的是对殖民者的严厉批判，对民主自治的热烈向往，以及先进的社会科学知识。

庄孟侯经常认真地和林书扬谈论起学校的种种事情。他批评日本军国主义的教育是害人害己。有一次，他把日本汉学家做的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故乡土，人生到处有青山”分析给林书扬听。他说：“我们汉人也有一句‘男儿志在四

方’，又说‘四海为家’，本来这是鼓励年轻人突破闭锁、摆脱惰性的意思，而现在当权的日本人却拿它来鼓吹青年人到中国大陆、南洋等地去拓展日本势力。人生到处有青山，但青山都是有主的，是人家的故乡土。日本人却惯用大炮刺刀去占领别人的‘青山’。”

又有一次，当他们一起讨论到南门墓地事件时，林书扬故意反问道：“墓地变成运动场，不是对台南市的发展很有利吗？”庄孟侯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开口说：“过去发生过的任何一件事都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孤立事件。日本人说迁墓地是为了市区的发展不过是一种借口，实际上它是总督府殖民政策中的一个重点项目。他们公开宣称新的综合运动场是台南市民献给天皇即位大典的最佳贡品，我们就是冲着这一点反对的。我们冒着被罗织成不敬罪的危险，呼吁大家合力把它顶回去，殖民地人民从此有了反抗的信心，日本人也知道了台湾人民不是可以予取予求的。我们当时相信这样做比市区的发展更重要。只要人心在，区区一个市的发展，我们会自己去推动。殖民主义者的发展计划还是为了他自己，代价却要我们来承担。”庄孟侯这番评析给林书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庄孟侯书橱的隐蔽处，林书扬发现了一些薄薄的小册子，其中有戴季陶的有关三民主义的论著，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中文本及日文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等。庄孟侯还送给他一部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教授编写的日文版社会科学辞典，并亲自指导他译阅，这本书使从小好学肯钻研的林书扬如获至宝，深受教益。

庄孟伦是庄孟侯的末弟，比林书扬大十几岁，是个温文尔雅又幽默机智的人。林书扬从小跟他玩在一起。他曾神秘地给幼小的林书扬讲过“十九路军”抗日的故事。1936年，庄孟伦在家庭的安排下到了大陆，投入抗日反帝阵线，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与陈仪的先遣指挥部同期抵台。这时，林书扬已在台湾糖业公司第三分公司（设在麻豆）任小职员，两个儿时的伙伴又聚在了一起。庄孟伦虽名为国民党员，但思想进步，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回台后时常利用正式的职务活动去掩护、支援进步人士和群众运动，终于1950

年七八月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比林书扬被捕晚两个月)并判死刑,罪名是“制作台湾西部和南部海岸线的地形图和海流潮汐表等准备给中共”。林书扬对庄孟伦丰富的国内政治知识、精辟的社会批判观点、豪迈而诚恳的待人风格以及过人的胆识颇为心折。庄孟伦曾坦言,人死如树叶落地,没什么大不了,为信仰而死死得其所!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对林书扬影响很深,成为其日后“不怕把牢底坐穿”的思想根源之一。

林书扬就是在这样一个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交织且不断激化的社会背景中成长,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的汉民族主义和社会平等思想的家族里接受了思想启蒙,日据时代台湾人民遭受的种族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悲惨处境深深刺激了他,家族的教育影响了他,故在他的心灵深处渐渐萌发了要自由、要尊严、要平等的强烈愿望,树立起反对殖民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坚定信念。追随着前辈和兄长们的足迹,林书扬在青年时代便投身于台湾社会的民族民主运动之中。

走过炼狱——34年囚徒生涯

1944年,林书扬在不够当兵年龄的情况下被日本殖民当局强行抽去服教育性兵役。其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曾两次被日军当局指派回乡参加稻收,以便保障军粮的供应。每次回乡,总有一些“农民运动组合”组织和“文化协会”的人找他证实有关美军登陆台湾的消息,更有农运干部与他讨论美军登陆台湾会有哪些前兆。在当时因日本尚未投降,谈论这些话题还是相当敏感而危险的,但是为了使台湾人民能够避免一旦美军登陆会带来的无辜伤害,林书扬还是秘密参与了台湾人民的自保工作,反复教授大家学说英语“我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等。

1945年9月抗战胜利,林书扬回到家乡,因家境已很拮据,无力供他上大学,便在糖业公司当了一名小职员。在家乡,他以满腔热情参加了一个名叫“还中会”的青年组织,宗旨是尽快让台胞了解祖国

大陆的政情，为回归做好准备。为此，他们买来报纸、刊物，将其中的政论文章剪贴成宣传品，到处散发或张贴；开办国语训练班，维持社会治安，并出了几期反日迎回归刊物。国共内战爆发期间，林书扬尽力搜集祖国大陆的各种消息给大家作介绍，并到处宣传反蒋独裁专制、“反内战”、“国共和谈”、“和平建设，改善民生”的主张。“二·二八事件”发生后，林书扬被国民党当局认定参与幕后指挥工作，列入黑名单之中。

1949年前后，国民党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准备选择台湾作为退路。为了确保台湾安全无虞，国民党先期来台的特务系统在“二·二八事件”的善后处理中，加紧清理岛内潜在的“危险因素”。1949年5月1日，全岛实施户口总调查，21日发布军事戒严令。与此同时，蒋经国亲自指挥，对凡在日据时期参加过反日运动的人，日本投降、国民党接管前的一段“真空”时期内在台有活动的人，“二·二八事件”中有所表现的人进行大搜捕。上述这三种人，几乎都是台湾社会中的左派人士，并且许多人是三类活动都参加过的。林书扬笑着告诉我们，“三条兼备，铁定死掉。”他是具备后两条的人，但麻豆林家的背景很容易让人将第一个标准与他牵联在一起。在上述背景下，厄运终于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0年初，家乡麻豆进行农会理事长改选，深受乡亲爱戴的医生谢瑞仁获得连选连任，而亲国民党当局的人却遭落败，此事引发了当局的怀疑与不满。同年5月，国民党当局借故以“共谍”罪名拘捕了谢瑞仁及其支持者共36人，其中包括林书扬。同年9月，谢瑞仁等三人被判处死刑，林书扬等若干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十余人被判处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史称此为“麻豆案件”。10月，“麻豆案”的“犯人”被遣送到台北市军人监狱，1952年再转送到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绿岛新生训导处。“麻豆案”改变了林书扬一生的生活。

绿岛位于台湾本岛以东偏南18海里处，是个四面汪洋的孤岛。岛内多丘陵，中部较高，林木葱茏，并有小溪向四方辐射，环境优美。多年以前，一首《绿岛小夜曲》从台湾的校园传到大陆，曾激起无数莘莘学子对祖国宝岛风光人情的畅想，然而对林书扬来说，“绿

岛”则意味着专制、残忍和苦涩。

早在 1950 年,这里即成为与世隔绝、专门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林书扬等大批“政治犯”就被关在这里。集中营在管理上,主要是利用心理压力,不断制造恐怖,并以所谓的“政治教育”强迫“政治犯”洗脑,剔除“反动”思想,以不堪忍受的苦役摧垮“政治犯”的意志,达到令“政治犯”“悔过自新”的目的。当时的林书扬只有 25 岁,风华正茂,生命力正蓬勃盎然,美好的生活正等待着他去品尝,年迈的母亲还需要他去照料,然而“无期徒刑”的判决,意味着他将在牢狱中度过漫长寂寞的岁月,远离自由与尊严,意味着现实的残酷与理想的飘渺将不断地在他的心中交织,只要瞬间的犹豫和动摇,就有可能降格以求。坚持信仰,战胜本能,从而升华自我,对一个人来说,该需要有多么执着的追求、坚强的意志和乐观的精神啊!年轻的林书扬是如何经受住了这炼狱的考验呢?

回忆绿岛监狱的生活,林书扬感慨地说,没有这一段集中营生活的磨难,他今后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是因为,在集中营里,“政治犯”们是被集体关押在若干个大房间中,劳动时则可分散地进行,这种管理方式有利于难友们相互交流信息、相互鼓励和安慰,从而共渡难关。在集中营里,“政治犯”首先要面对的是恐惧。恐惧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狱方制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笔记本上改动几个字,将原意歪曲,然后以此为名,将那人拉入“碉堡”刑讯逼供,以图诈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待的案情。二是突击检查。即乘“政治犯”不备或外出劳动之机,全面检查营内每个人的床位,一旦发现笔记中有“反动”或不满言论、违禁书籍,轻则以“抗拒改造”为名施以酷刑,重则遣送回岛内,结果必死无疑。林书扬给我们列举了这样一件事情:在一次突击检查中,狱方发现了一名“政治犯”来不及撕掉的一首打油诗,上面写着:“挑不完的石头受不完的罪,良心良心几块钱一斤。”由此认为这是对狱方不满,而将诗作者拉入碉堡打个半死,令整个气氛相当恐怖。林书扬说:“这样的突击检查经常发生。他们一定要尽力让你感受到当局的力量,让你产生恐怖无助的感觉,从而放弃反抗行动。”恐惧的第三个来源是看到岛内来人,尤

其是特务系统的来人，它常常意味着某人的案情又有了新的发现，以前隐瞒未报的案情终于暴露，其结果必然是罪责加重，生死难卜。一到这时，人人自危。

恐惧之外，苦役也是“政治犯”难以承受的。“政治犯”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是被强迫劳动，不是到山上去砍树木和茅杆，就是到海边去搬运大量的石头垒狱墙。每天早晨，“政治犯”被集合起来宣布任务，然后到指定地点分散劳动，收工后狱方要检查每人任务完成的情况，达到标准的被认为是合作者，否则难免遭到毒打。然而这样的“合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不过是“终极合作”的第一步，真正的“合作”必须是彻底屈从。再有，无人可以有足够的体力来长期支撑这种“合作”，更何况一个不屈的心灵怎会指挥它的身体去长期屈从呢？

为了有尊严地生活下去，“政治犯”们不断地寻找各种办法与狱方斗争。他们团结起来，互助互帮，以把恐惧与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集中营的集中管理方式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面对强迫劳动，他们采取消极抵抗的办法来保护自己。例如在山上，大家自己做秤，统一斤两，共同承担完不成任务的责罚。由于经常有一整天的时间可以在毫无监视的情况下劳动，大家便借此机会放松身心，在远离集合点的丘陵林木深处，时而唱歌，时而讨论从报纸上得来的极少量外边的消息，如古巴导弹危机、大陆的“大跃进”运动、三年自然灾害等等。有时还针对斗争策略进行检讨，彼此安慰和鼓励。有时则聊一些各自家里的情况。就这样，“政治犯”们有了一块他们称之为“解放区”的自己的天地，结成了一个相互信任、相互支撑、同仇敌忾的坚强集体，任何一念之间的软弱与退缩都会被这个集体的力量扫除干净，集体成为“政治犯”们的精神寄托和坚强后盾。

战胜恐惧，还基于对岛内外形势的理性分析。林书扬回忆说，当时“政治犯”们经研究后认为，就岛内形势来讲，国民党当局因顾虑到“二·二八”给台湾人民造成的心灵创伤，出于缓和矛盾、巩固统治的需要，不能不慎重对待台湾“政治犯”的处理问题；就国际局势来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对蒋介石政权的态度由消极转为积

极，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极大地阻挠了祖国大陆解放台湾的部署，使逃台的蒋政权能够从容立足台湾。这些决定了国民党政权不会贸然进行大屠杀，只要大家心中有数，采取消极抵抗而不作无谓牺牲，就可坚持到底。认清了形势，大家的斗争勇气增强了，彼此之间相互保护、提醒，即使被施以苦刑，大多数人也能咬紧牙关，不出卖难友。有一次，集中营排队点名后，站在林书扬身边的一位难友遭到狱方的恐吓，让他供出林书扬是不是没有与大家一起唱“国歌”，结果这位难友一口咬定“不知道”，敌人在一顿毒打之后，只好无可奈何地把人放回来。然而尽管这样，这位难友回来后仍不顾伤痛，提醒林书扬要注意。

对有期徒刑者来说，战胜了恐惧，就等于走过了狱中最艰难的关口，而对林书扬这样的无期徒刑者来说，这不过是刚刚承受住了炼狱的初步考验。

1960年，当第一批难友即将刑满释放时，林书扬的内心掀起了极大的波澜。长期相濡以沫的难友们，一些人即将摆脱牢笼投入新的生活，还有一些人虽仍将继续与他共患难，但终有一天也会被放出去，而陪伴着他和极少数人的将是终生无休无止的恐怖行动、强迫洗脑和苦役。缺少了战友的相互掩护，缺少了集体的精神依托，仅靠他和少数人的力量，能够战胜未来尚不可知的各种压力吗？林书扬将怎样接受这再一次的考验呢？

回忆这段经历，林书扬淡然地说：“好在O型血，性格外向开放，又爱看书，自我平衡调节情绪还是能做到的。”难道事情就这样简单吗？在我们的一再探究下，林书扬又提到了他的表兄庄孟伦，提到了庄孟伦曾一再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生死本乃寻常事，人死就像树叶掉落地上一样简单，没什么了不起。”说到这里，林书扬激动了，“也许孟伦早就料到我今后会是这样，所以才不断地告诉我这些。我如果屈服了，怎么对得起他！”说到这里，老人有些哽咽。一瞬间，我们猛然深切地体会到老人内心深锁的屈辱与酸楚，领悟到当时他内心经历的失落、感伤、孤寂和无望，明白了他是以怎样超凡的定力告诫着自己，以兄长的榜样激励着自己，才度过了思想斗争异常激烈的

整整一周时间。在这一周里，他摆脱了生命的羁绊，艰难地闯过了生死关，从而完成了自我境界的提升。从此，他只是一个不屈的魂灵，为他的精神信仰而生活、奋斗！此时对林书扬来说，铁窗内外已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

集中营的13年，林书扬从青年步入中年，变得更加成熟、沉稳、坚定了。

1963年，绿岛的“政治犯”分几批全部移送到台东县泰源乡大武山半山腰刚建成的泰源监狱。这里不再有大规模的强制洗脑与强迫劳动，每人每周除了有一两天，每天一两个小时的“政治教育”之外，主要是在牢关押。每间牢房按规定住10人，最少时是五六个人。监狱每天上、下午各放风40分钟。林书扬在这里被关押了9年。

由于监狱的管理方式不同于集中营，“政治犯”们的斗争手段也相应地有所调整，重点放在充分利用时间看书学习、练习写作，更多了解外面信息，充实狱中生活上。而狱方有了集中营的教训，对“政治犯”的正当要求也多少予以考虑，比如允许投稿，组织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在院内种菜等等。然而不久，由于“政治犯”们投稿的报社发现“共谍”以及“台独”案犯集体越狱事件暴露，投稿、种菜之事一律取消，大家便把主要精力放在钻空子找书源上。

狱中规定“政治犯”可以买非政治性的书籍，由政工官负责检查新购书籍的内容是否有问题。一些政工官检查得比较松，大家便利用这样的机会获得一些本属于违禁的书籍，如50年代美国麦卡锡委员会“扫红”的书、美国历史书籍、日本左翼人士安田的《人类的历史》、具有唯物论色彩的日本《哲学辞典》，甚至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等都进来了，并成为“政治犯”们暗中传递的“抢手货”。在狱中的政工官里，有个别人是不甘于做狱卒而想报考日本警察大学的，他们经常向“政治犯”求教日语，这些“教师”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建议这些年轻人订购了一些课外读物，如《朝日新闻》或其他书刊，这些成了大家了解岛内外局势的主要信息来源。

1972年，为庆祝“中华民国建国60周年”，蒋介石颁布“特赦令”，将四十个左右老弱病残或有特殊背景的“政治犯”予以释放，林

书扬等人则又被送回绿岛(原来的训导处已改建成“国防部”绿岛监狱)。1975年蒋介石去世,又有一些“政治犯”获减刑释放,这时只剩下林书扬等三十余人继续被关押。

我们已不怀疑林书扬会坦然面对这又一次的冲击,因此我们没有打断老人的回忆,继续静听他述说最后的结局。“从75年又坐到84年,这期间大格局又有所变化,美、日与大陆关系缓和,台湾经济不断发展,国民党政权相对稳定,监狱里的管制也更加宽松,能够看到的报纸、书籍不断增加,一些经济学、中外近代史的书籍也可以买到,令大家感到被释放是迟早的事。大约在1982年,三十多人只剩下24人(其中一些人已经去世),我们中有人收到从巴黎、纽约、北欧等地寄来的邮包,大家研判认为,是外界知道了这里有被长期关押的犯人,世界人权组织已对此表示关注。”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83年初至1984年底,二十几人分三批获得假释,林书扬是第三批最后两个被假释者之一。

不懈奋斗——反独促统护劳工

出狱后的林书扬,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他的家族因种种缘由已四分五裂,留给他的是一份有行无市的房产和田地。不久,他与一位“政治犯”的遗孀结了婚,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彼此抚慰,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在交谈中,林书扬没有讲这些私人生活中的遗憾,他侃侃而谈的是那些他在狱中不断思考、出狱后积极从事的事业。例如,如何安顿那些饱受磨难的难友,争取“政治犯”复权和平反;如何开展台湾的劳工运动,促进劳工阶级的觉醒和彻底解放;如何遏制“台独”思潮,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等。

为了解决“政治犯”出狱后大多没有正式职业的实际生活困难,出狱两年后,林书扬发起组织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近千名政治受难人参与其中,他被大家推选为首任会长。在互助会里,大家除了就难友们互帮互助达成共识,还就“追求统一、争取民主”的政治目标统一了认识。以“互助会”的成立为标志,林书扬正式

投入反独促统的运动之中。出狱初期，因“戒严令”尚未解除，加之他还戴着“假释”的帽子，所以活动比较谨慎。1987年“戒严令”解除后，林书扬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大：1988年参加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工作，担任“统联”执行委员会委员；1990年参加台湾“劳动党”的建党工作；1992年担任“统联”的主席职务，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而奋斗；1993年出任“劳动党”副主席，为维护劳工权益而奔走。

作为一个“假释者”，林书扬所做的一切无疑会给他带来相当的危险，当局随时会以各种借口重新将他投入监狱。那么，是什么力量驱使这个历经磨难的老人又全力投入新的历史使命呢？林书扬对祖国统一、对劳工问题为何会抱以如此巨大的热情呢？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林书扬首先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入手的。他认为，统独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台独”形成为思潮是在70年代中期之后，台湾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中产阶级随之壮大，于是提出他们的政治要求，这一要求的极端化就产生了“台独”问题。台湾中产阶级与大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样具有两面性，但是因为它不像大陆民族资产阶级那样几乎失去发展机会，而且又是美国援助下的既得利益者，所以其中一部分人的反动性大大超过其进步性。就现在来说，台湾中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在台湾社会由威权体制向竞争体制过渡时期所表现出的进步性已过去，其反动性的一面却表现得相当充分，即一方面无条件亲美日，感谢美国对台湾的援助，一些人甚至感谢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在国家领土主权问题上，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甚至有人想把钓鱼岛主权拱手让给日本；另一方面则全面继承了国民党政权反共的衣钵，全然不顾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顽拒和平统一，鼓吹分裂分治等，目前台湾当局的“独台”路线即是在此种背景下形成的。如何制止“独台”分裂路线的继续呢？林先生认为，只要中国大陆持续地发展壮大，在港澳回归后成功地实施一国两制，不断地密切两岸的经贸联系，全面加强对台湾人民的工作，就能给岛内的“台独”和“独台”势力以极大的打击和遏制。